

雲淡風輕與慷慨激昂 ——走近作家李銳

採訪、撰文：張洛寧



去機場接李銳老師那天，不知道甚麼原因，機場告示牌上寫着乘客將於「A 出口」到達接機大廳，而那航班的乘客們卻是從「B 出口」走出來的。我在 A 出口等了一陣，還沒有見到人，恰於此時收到學校的電話，說李銳老師到了，卻沒有見到接機的同學。我飛奔至 B 出口，遠遠地便看到一個清瘦的側影，標誌性的髮型和濃眉短鬚，立在行李車旁邊，眼睛茫然四顧，像在尋找誰。是他，作家李銳。

溫和淡然，是我對他的第一印象。

他聲音溫軟，不急不緩，自然親切。我是個不善於破冰的人，可第一次見面的我們，從大學生活一路聊到了隋唐建築和吳道子，彷彿相識已久。說到喜歡的東西，他眉飛色舞，「山西是個文物大省，中國一共只保留下來了五座唐代建築，山西有三座半。」「佛光寺我去過很多次了，當年日本人說中國沒有唐朝建築，梁先生，梁思成先生不相信，說一定要找到唐代建築，後來在古籍上看到有

佛光寺的存在，梁先生帶着林徽因和兩個研究生，到五台山裏面，還真找到了佛光寺。」這故事我也聽過，考察隊在佛光寺進行精密測量，在大樑上發現了唐代的題字「大唐大中十一年，工匠某某某」的字樣，證明了中國也有唐代木結構建築的留存，回擊了日本人的嘲笑。「唐代的那種斗拱跟後來清朝用的完全不一樣，那個斗拱要大出好多倍來，因為清代的斗拱都是裝飾性質了，不承重，唐代的房樑完全是靠斗拱撐起來的。」「那牆上的壁畫，漂亮極了！那些個線條，每一筆都特別生動。……還有門口的那兩棵樹，漂亮極了！」他說得愉悅，像個孩子在說心愛的玩具。我心裏頗為感動，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他對中華文化的熱愛，對文物的珍重。而他微笑着點頭的時候，我在他身上感覺到了一種，歷盡滄桑後返璞歸真的，父親的味道。

這讓我些微有些困惑。讀了他的幾本書，雖沒有刻意想像，但在我心裏，他或者應該是個嚴肅沉默的書寫者，或者應該是個激情澎湃的「老憤青」，無論如何，都不應該是這一副雲淡風輕的樣子吧。這樣的雲淡風輕，是如何包容起《人間》裏瑰麗奇絕的前世今生，如何包容起《舊址》裏刻骨銘心的愛恨情仇，如何包容起《張馬丁的第八天》裏「一個人的創世紀」的？

《張馬丁的第八天》是李銳老師最新的小說作品，以義和團運動和教案衝突為時代的大背景，描述了張馬丁，一個外國傳教士的精神救贖之路。讀這部作品的時候，有諸多不解。不知道甚麼叫做「你們的世界在七天之內，我的世界從第八天開始」，不知道為甚麼說這是張馬丁的「復活」，不知道張王氏為何聖母附體，而最後卻又順河流漂走，不知道作者為何彷彿覺得人間充滿罪惡。

我問李銳老師，一個代表着正義和仁慈的高主教，為何會在發生張馬丁「死而復生」的事件之後執意讓張馬丁「假死」？老師沉吟片刻，告訴我他不想寫一個純粹的好人或者純粹的壞人，也並不想表達甚麼社會學領域的批判或是認同。他這部作品，是想嘗試着用平等地心態理解和表達西方人和東方人，表達以基督教和娘娘廟為代表的西方和東方的宗教和文化。這個高主教，他從心底裏認為

他的上帝才是偉大的，獨一無二的，他認為用無論甚麼方法，去「拯救」異教徒，使他們放棄愚昧的信仰，轉而信仰上帝，是他最大的慈悲。他卻沒有意識到，或者說明意識到，卻不願意承認，他是以上帝之名犯罪。這其實是歷史上宗教的共性，也是人類的罪惡。十字軍東征，所謂聖戰，就是打着神的旗號對人的屠戮；第二次世界大戰，法西斯國家打着「消滅劣等民族，淨化人類種族」的旗號，把幾百萬人送進了焚屍爐。很多的罪行，都有高貴的旗號。還有一個例子，就是新文化運動，我們幾代人前仆後繼地從西方請回來的真理的火炬，德先生和賽先生，民主和科學，以魯迅先生的話說，就是「從別地竊得了火炬，本意卻是要煮自己的肉」，這話說得何其悲壯！可是結局是甚麼？真理的火炬自己出了問題，第二次世界大戰，就發生在人類文明程度最高的歐洲。它不是發生在「劣等民族」亞洲人、非洲人這裏，是發生在歐洲。這事本身就是一種巨大的幻滅，足以引發非常多的思考。所有西方現代和後現代作家都繞不開這個話題，他們不敢轉過頭去。

一向雲淡風輕的李銳老師此刻眉頭深鎖，目光如鷹隼般犀利，令我看個怔了。他說，美國有個作家庫克·馮內科特寫過一本小說叫做《囚鳥》，囚鳥裏有一個故事是說，美國有個大兵，上尉，在歐洲作戰的時候，跟一個猶太姑娘談戀愛。這個猶太姑娘是從奧斯維辛集中營裏生存出來的。兩個人談戀愛，上尉說咱倆結婚吧。猶太姑娘說不。上尉說你愛我嗎？我愛你。那你為甚麼不結婚？猶太姑娘說的話讓我淚流滿面：人類沒有能力辦好自己該做的事。我們人類不過就是宇宙裏污染了地球這麼一小塊地方的物種。我之所以不跟你結婚的原因很簡單，我就是希望人類，不要再繁衍了，不要再擴大這種污染了。我看到這裏簡直是如雷轟頂！這個猶太姑娘從集中營那樣的地方出來，從焚屍爐那樣的地方逃出來，從地獄裏爬出來，她見過甚麼叫做真正的人間地獄。她對人性，對所謂人的理性，對人的文明的顛覆性的懷疑，這就是坐在真理的屍體上發出的哀歌。

整個採訪過程中，我幾乎沒有甚麼插話的機會，而事實上，老

師一路慷慨激昂，把我想問的，和沒想到問的問題，全部一股腦講了出來。這時候的李銳老師，神色愈發激動。他說每次講到這個話題都會非常激動。

他說，我們中國當代的作家，全都是以一個「跪姿」去面對西方文學，人家的就是好的，甚至於這麼多年已經形成了習慣性的、自己都無意識的「跪姿」。我們一茬又一茬的作家，都是在模仿人家，覺得模仿人家就找到了真理。我們從來不是以一個平等的心態去試圖理解西方。我寫張馬丁，寫他本來是那麼虔誠地信仰上帝的人，結果因為這一場教案，他被視為是叛徒，猶太，開除教籍，飢寒交迫，最後被那個張王氏（作者註：因張馬丁「假死」而死的村民之妻）所救，還發生性關係，這在基督教裏是完全與教義相悖的，對於他來講是多麼大的一種精神上的顛覆和幻滅。而後來張王氏和村裏其他幾個女性跟張馬丁生的混血兒也都被送走，這都是悲劇，母親和孩子生生分離都是悲劇。這本書是我一次嘗試，嘗試去平等地去理解西方，也平等地、深刻地表達我們自己。我覺得我還算是做到了。

我問，在很多作品裏，老師都表達出這是一個「罪惡的人間」，為甚麼會有這樣的表達？老師又很感慨地說，我是這樣覺得的，我是覺得人類有太多的罪惡，可能是跟我自己的經歷有關。因為我父母都死於文革，那個時候我十幾歲，我們都是長在紅旗下的一代，都有着特別崇高的革命理想，結果經歷了一個非常大的幻滅，理想的破滅，而且家破人亡。文革的時候，就我父母單位裏的那些叔叔阿姨，平時都是多麼和藹可親的人呀，文革裏都變得面目可憎。包括後來我們去山西插隊，那時候那些鄉親們告訴我們說我們現在之所以這麼窮，都是甚麼造成的呀？大躍進！這個答案對我們的衝擊太大了。在山西我們才真正體驗到甚麼叫做勞動人民，都說勞動人民很偉大嗎，其實一點也不偉大，也不光榮，我們才知道甚麼叫做勞動人民。你知道經歷了那麼樣的一個巨大的幻滅之後，我就開始對所謂的人類的理性有些懷疑。因為人類作的惡實在太多了，包括你我，我們都在人類的範圍裏啊，我現在只能說是懷着一種悲憫之

心，希望能用文學探討一種人類的共同的精神困境。所以說我們中國的作家，也不能繞開這個基本的話題，不能說拋開整個人類的歷史，去獨創一些甚麼屬於我們中國的悲劇。那些都是不現實的。還是我說過很多次的那句話，我覺得所有華文作家寫作的最高標準和最低標準就只有一個：用方塊字深刻地表達自己。

一旦從這個沉重的話題裏脫身出來，李銳老師就又變回那個雲淡風輕的普通父輩。我們坐在一起閒聊的時候，我問起他的女兒、也是作家笛安，他說笛安在翻譯一本書，然後又加上一句自言自語般的感慨：「笛安比你大九歲呢」，說起他其實並不希望女兒寫小說，因為「實在是太苦了」，身邊有太多寫了一輩子小說的朋友，還在不斷地經歷被退稿這樣的事情，可是女兒當時在法國，一個人，甚麼都要靠自己，「心裏憋得慌，她就得寫出來」。我看到一個父親心裏的心疼，對於文學這條路，如人飲水，冷暖自知。

在科幻作家劉慈欣的那本《三體》裏，他描述一個文革受迫害的女科學家到了如今時代的樣子時說：那種溫和淡然就像是每一個從那個時代走過來的老知識分子一樣。他們經歷過轟轟烈烈的理想，經歷過驟然幻滅的災難，經歷過涅槃重生的重建，經歷過新時代新的生活新的美好和新的痛苦。一切都變得如天空中那朵閒雲般淡然，然而心中的那股少年以來的便壓抑着的火焰，總還在心中跳躍燃燒。如今再讀李銳老師的書，你盡可懂了，那種講述沉痛時雲淡風輕的口吻從何而來，那種對全人類精神困境的關注從何而來，那種激昂和悲憫從何而來。